第一卷 第二期 2010/11

全球对话——国际社会学通讯

國際社會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主编的话

第二期的全球对话有一场关于「全球社会学」精彩的辩论：《风险社会》一书的作者Ulrich Beck从批评方法论的国族主义切入，认为全球社会学应该是一种批判的世界主义转向，并认为，既有的全球社会学框架无法处理当代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问题；另外，《南方理论》的作者、同时也是知名的女性主义学者Raewyn Connell则指出，Beck的世界主义社会学不过是另一种「北方观点」罢了，因为Beck忽略了来自南方的多元声音。而这期通讯，我们听到了巴西、孟加拉、中国、吉尔吉斯、印尼、白俄罗斯、波兰、德国等世界各地的声音。这些声音若是听起来像是在振臂疾呼的话，那是因为社会学正处在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交叉路口上。未来四年我们将持续对话交流，特别聚焦于球化下的不平等与排除。这个关怀同时也是2014年世界大会的主题，而且，我也非常高兴地在这里跟各位报告：世界大会的筹画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最后，再次谢谢以下的译者：August Bagà、Lola Busuttil、Gisela Redondo(Barcelona)、何经懋(台北)、Genevieve Head-Gordon(Berkeley)。投稿及意见请寄给主编：Burawoy@berkeley.edu

本期内容

社会学的世界主义转向	1
编织世界社会学?	1
历史一隅	2
富士康：全球的掠夺者	3
达卡：绝望之城	3
社会学电子论坛	4
2014世界大会	4
论「LULISMO」	5
纪念Mattei Dogan	6
白俄罗斯：社会学遭到威胁!	7
会议	
印尼：全球迁徙	6
波兰：社会怎么了?	8
吉尔吉斯：突厥社会学	9
德国：跨国主义	10

亲吻青蛙：社会学的世界主义转向

Ulrich Beck，Ludwig-Maximilian University，Munich

Michael Burawoy的「面对全球社会学的挑战」这篇文章 (Global Dialogue, Vol.1, No.1)相当激励人心，但是，他却没有清楚说明：所谓的全球社会学只是一种新的观点，用来补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学，或者是一种革命性的观点，一种批判性的转向，可以用来取代既有的主流社会学？若是前者，我称之为「全球社会学」；后者，我则称之为「世界主义社会学」。

当世界秩序瓦解的时候，通常就是社会学对于占有支配地位之理论与研究进行反省的良机。可是，很令人惊讶的地，事实并非如此。主流的社会学理论仍然以一种优越且自信的姿态，笼罩在时代变动(气候变迁、金融危机、民族国家)的上空。这种普世的社会理论，无论是结构主义、互动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系统理论，早就已经过时了，而且变得相当

现在让我们亲吻青蛙，看看青蛙会不会变成王子—开始重新对应这个全球化时代之中的新制度

(文接第2頁)

我们要如何编织世界社会学?

Raewyn Connell，University of Sydney

Ulrich Beck是一个具有丰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社会学家。从他的「风险社会」一书中对于欧洲的反思和社会动态的精彩分析，让我们都获益良多。在1990年代，他如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发现了全球化，并出版了「世界风险社会」和「何谓全球化」等书籍。现在，他进一步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纲领：世界主义社会学。

看到Beck从整个世界的层级来观照社会，真是让人非常开心。但是，他看到的是对的吗？Beck提到了讨论世界主义的都是欧美学者，却没有进一步讨论为什么会是这样。

Beck说早期社会学的问题出在方法论的国族主义—即是在方法和理论中预设了社会的边界(文接第5頁)

（文接亲吻青蛙：社会学的世界主义转向）

狭隘。之所以过时，原因在于这些理论排除掉了那些可观察的到的先验存在：在现代性下社会与政治的基本转型(从第一现代性到第二现代性)；之所以狭隘，是因为把西方的历史轨迹和对于未来的期待(像是欧洲、北美、现代)错误地视为是必然绝对的，看不到任何可能的特殊性。

这是为什么我们除了全球社会学，还需要社会学的批判性转向。然而，社会或政治理论要如何可能在理论、经验、方法、规范上，敞开视野去处理这种复杂且又质疑自身存在的现代性呢？又要如何解释21世纪那些被资本与风险全球化所形塑的社会变动(包括未意图后果、脆弱、易变)？什么样的理论或方法将会兴起，而经验上要怎么去处理？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要对把行动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绑在一块之关于社会与政治的强大信念—方法论国族主义，提出质疑。方法论国族主义把现代社会和以民族国家为疆界的社会划上了等号。此外，我们还要追问：在21世纪，世界主义的视野对于社会人文学科来说，又意味者什么？

1. 对于方法论国族主义的批判

简单来说，方法论国族主义预设了国家、民族、社会是当代社会与政治的自然形貌。当行动者同意上述预设，我称之为国族观点；若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接受了，我则称之为方法论的国族主义。行动者与研究者之间对于上述观点的差异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它们之间有一种非逻辑的历史连带。而这种连带则导致了方法论国族主义的许多规则。方法论国族主义不是表面的问题，也不是现代的错误。其包括了资料的收集与生产，社会、阶级、家庭、国家、民主、国际关系等基本现代社会观念的转变。

再者，社会学者企图把特殊的个案普遍化，然后据此普遍地宣称社会如何形成(我的书Risk Soceity[1986]　　也是)。美国的社会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并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和美国差不多(只是比较穷而已)。「去研究一个特殊的社会然后普遍化、推论所有其他的社会都是一样的」这种观点被广为接受。这也让他们去争论何谓秩序和冲突的本质。换句话说，秩序与冲突在美国社会中被检验，然后得到的所有理论都预设了其他社会(至少是那些富裕的工业社会)也是如此。社会学在过几十年来就是这样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在运作着。然后，全球化研究接着登场。

2. 如何去研究全球社会？这不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年代，但是我们正朝此方向迈进。

我们可以区辨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字的三阶段意涵：第一，拒绝；第二，精炼概念与经验研究；第三，世界化(cosmopolitization)。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因为第二阶段的经验研究和概念精炼之后揭露了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新社会图像(例如Held等人着的Global Transformations)。全球化的支配性格包括了相互连结性(interconnectedness)，意味着全球人类的相互依赖。事实上，人们经验的扩张，或多或少都被这无与伦比的相互连结性所影响(这不应该与世界系统理论或依赖理论相提并论)。

（文接第10頁）

历史一隅

Jennifer Platt，University of Sussex，出版副会长

ISA的期刊历史清楚的说明了ISA和社会学的发展脉动。1973年，第一期Current Sociology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出版，这是我们那时唯一的一份刊物。每一期都包括了不同次领域的图书目录型文章，到了1990年之后才变为一般传统型的文章。1984年International Sociology开始出版。它在传统的形式下有着非常清楚的国际化任务。1999年增加了书评，并且也努力试图要国际化，这部分后来成为了另外一卷次：IS Review of Books。同时，Current Sociology 也增加了新的卷次：the CS Monograph，主要是具焦在研究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过的研究领域为主。最后，2005年电子公告成立，它是非常具有原创性的平台。近来，它的创意和参与度的提升让人相当吃惊。

谁做了这些编辑工作？性别比例可能并不符合大家的期待。女性编辑的比例从1970年的100%(Margret Archer，也是后来唯一的女性会长)减少到2000年的67%；国籍的比例也很有趣：1990年之前，百分之百都是英国人。然后加拿大、欧陆国家、以色列、新加坡开始加入，虽然英国仍还是多数。这之中很令人讶异的是竟然只有一位美国人：Said Arjomand；法国则是一位也没有。以英语为母语的优势显而易见，而进来稍有些变化。最后一期的编辑(有来自巴西、印度、澳洲)呈现出国际性的成长。然而，语言和在地资源的问题也一直被提出来讨论。

富士康——全球的掠夺者

Jenny Chan，University of London

台湾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囊括了全球超过50%电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营收。在亚洲、俄国、欧洲、美国等地，富士康也设立了超过40间的工厂和研发部门。2010年1月到9月的总营收达1.95兆台币(608.2亿美元)，将近是去年总营收的63%，甚至超越了一些富士康所代工的那些排名全球前500大企业品牌商(如微软、Nokia)。随着政府的庞大支出和对消费性电子产品需求的快速成长，中国的出口贸易很快地就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荣景。然而，中国的廉价工资和打压劳工人权的政策，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吗？是道德的吗？在中国的富士康—世界电子产品工厂，今年初就有17位工人自杀。这桩悲剧导致了13人死亡、4人受伤。他们都是17到25岁的年轻民工。这些年轻生命的殒落，应该唤起中国和世人们对于发展主义模式的反省—反省我们为了经济成长和高额利润付出了多少代价，牺牲了多少人性尊严，以及失去了多少的生命。

富士康937,000名中国员工之中，有超过85%的人是已婚者和年轻人。1980和199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对于生命有较高的期待。他们受过较高的教育，渴望跟上时代潮流，向往多元的大都市。然而，一旦对未来的期望越高，就越突显出他们实际生活上的艰难和困苦。由于中国的农村户口制度，当年轻民工被最低工资和稀少福利的工作绑住时，他们其实有着很深的焦虑与不安。富士康的工人位于世界商品供给炼的最底层，被剥夺了合理的工资和基本的社会安全。不论在富士康或其他工厂的中国工人，都仍然是位于社会边缘的次等公民。

世界性的领导品牌商深深影响了与之合作的契约厂商。例如，Apple就压榨世界各地供应商的利润，并对于这些

（文接第7頁）

富士康工人

达卡：绝望之城

Habibul Haque Khondker，Zayed University，執行委員

2008年，世界将近70亿的人口之中，超过一半的人住在都市。这是历史的里程碑。早在1800年，世界上只有3%的人口生活在都市；1900年有14%；1950年则为30%。亚洲则是都市化的大本营，拥有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2000年全球10大城市之中有5个在亚洲(东京、孟买、上海、加尔各达、德里，分别排名为1、5、6、7、8)。事实上，前10大城市中有7个位于发展中国家。

大都市达卡

做为全球第11大城市的达卡(Dahka)很有可能是其中成长最迅速的。1990年到2005年间，达卡的人口从600万暴增为1200百万。可以预测的是，2025年，前10大城市将会有8个位于亚洲，达卡也将成为第4大城，紧追在东京、孟买、德里之后。

从历史上看来，都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都市化通常并没有伴随由劳工发起的工业化，甚至一点非正式的工作也没有，那么结果就是贫穷的集中。达卡1500万人口中有28%的人住在贫民窟。这叫做「贫民窟化」，根本不是什么都市化。达卡的贫民窟导致了非正式经济部门的成长。大部分的贫民窟居民被整合进都市经济之中：有些是人力车的车夫，另外，有大多数的女性则是做都市中产阶级的家庭帮佣；达卡快速成立的工业部门也吸引了许多原本有工作的乡村女性进入城市。而因为都市划分并没有彻底执行，整个就是住宅区和商业区随便混合而成的大杂烩。其都市问题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让街道乱成一团的交通问题，这也让达卡成为世界上最没有秩序的城市之一。

孟加拉在解决贫穷问题上已经有所斩获，达卡的问题则是出在都市治理。因为它同时由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市政府同时管理，所以衍生出合作协调上相当复杂的问题。市长的属于Awami League，但执政党却是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因此变成了政治问题。执政党与在野党在意识型态上有着很大的歧异，彼此在重要的国家议题上常常互别苗头。

（文接第13頁）

成立「社会学电子论坛」

Vineeta Sinha，**National Universtiy of Singapore**，執行委員

Vineeta Sinha

2005年我开始参与ISA的电子公告。这是由Susan McDaniel (后来的出版副会长)所发起的。是他当初邀请我申请成为总编辑的。ISA的这项创意深深吸引了我这位担任过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编辑、来自新加坡大学社会系的社会学家。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雀跃的时刻，同时也想参与国际社会学界这个别具创意的新尝试。

这份电子刊物原本是设计用来做为呈现来自全球社会学社群之作品、想法、意见的园地，主题包括实证、民族志、人口学、理论、批判研究，并且在世界各地运作。某种程度上，电子公告从2005年设立以来，已经发挥了上述的功能。在发表过的议题之中会发现它呈现出全球社会学社群的多元性，而且处理过多层次且复杂的社会学问题。起初，它希望ISA的成员不但可以提出议题或想法，还可以参与学术辩论，但迄今这项目标尚未达成。

在历经5年、出版了16期之后，现在是一个适合的时机去将文章与其中包含的的概念重新整合，反映出这个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巨大变动的世界。这份刊物需要继续向前迈进，透过广泛取用与宣传，让内容与形式更具可读性。在开始阶段，改变刊物名称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它代表了新的认同与刊物的性质，因此，可能的选项是「社会学电子论坛」。它提供更多交换意见与互动的机会。

第二个基本的改变是这份刊物并不只是电子的(不使用纸本)，而且还是一份真正的数位化刊物。在这个时代，对于一个非纸本的刊物来说，网站、部落格、「Going Live!」就显得相当重要。我非常乐观的认为这将会有助于开启讨论、促成许多针对不同议题、立即且自愿性的意见交流。在21世纪的前20年里，新科技重新定义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我们社会学家所做的、想的研究也将会改变现在的数位模式。

将这份刊物数位化的想法，一方面是对于科技与社会交集的确认，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企图理论化这一连串交集所做的努力。这项科技将使得我们能够去呈现那些可以被看见、听见的作品，像是影片、图像、图文、或是声音等。在使的刊物内容更多元化、使得社会学家更能持续沟通交流的这点上，我认为这项创新非常有价值。如何实践此一想法的对话和协商正在进行中，我也邀请每一位成员在社会学电子公告成立(go live)之后拜访这个网站！■

2014年横滨(Yokohama)世界大会的筹画委员会

Raquel Sosa Elízaga，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Universidad，计画副会长

执行委员会已经核准同意成立了2014年横滨世界大会的筹画委员会。这经过了地区、性别、专业等多元的考量，也考虑到大会的名称：「面对不平等的世界：全球社会学的挑战」(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Global Sociology)。我期待这次紧密且规模庞大的国际性合作会让此次大会圆满成功。

筹画委员会主席：**Raquel Sosa**，计画副会长，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当然委员：
Michael Burawo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会长
Margaret Abraham， Hofstra University，研究副会长
Tina Uys，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国家学会副会长

筹画委员：
J. Esteban Castro，Newcastle University
Sari Hanafi，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执行委员
Koichi Hasegawa，Tohoku University，横滨世界大会在地委员会主席
Kalpana Kannabiran，Hyderabad University
Edgardo Lander，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University of Coimbra.
Markus S. Schulz，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Champaign
Benjamín Tejerina，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执行委员
Göran Therborn，Cambridge University
伊庆春，Academia Sinica，Taiwan，执行委员
Elena Zdravomyslova，European University of St. Petersburg，执行委员

（文接我们要如何编织世界社会学？）

等同于国家的边界。但是我们在Street Corner Society、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或是Ideology and Utopia等书中不太能轻易发现方法论国族主义。此外，Beck的史观忽略了前两代的欧美社会学家：从孔德和史宾赛，到恩格斯和Tönnies，再到涂尔干、Ward、韦伯、Sumner。

19世纪的社会学已经全球化了。他们不把民族国家做为参照点，而是整个人类历史。他们采用广大的殖民地资料，而且，其社会进步论的观点提供了我们理解帝国主义的扩张。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Beck不曾提及的两个概念。就像许多其他全球化的学者一样，Beck和世界体系或依赖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比较喜爱用无疆界的相互连结性—像是一滴墨水渗透到整张纸扩散开来一样。论及平庸的世界化时，他给了一个在讨论全球化时很常见的例子：在很多餐厅可以吃到各种料理，意即，有足够的钱吃遍全世界。

但容许我问Beck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什么样的群体是不可能吃遍全世界的？他们可能是那数十亿极度贫穷的人；可能是乡村居民；可能是不住在城市的人；也可能是那些因为要照顾老人或小孩而无法离开家去餐厅的女人；更可能是那些受工业无情压榨劳动、疲惫万分以致于无暇享受美食的男男女女；最后也可能是那些行动不便、病人、被污名化的族群或种族等所有被禁止进入餐厅用餐的人。

总之，第二现代性的观点反映了那些少数特权阶级的经验，然后把自己所看到的就等同于是这个世界新的真实现象。

（文接第12頁）

论「LULISMO」

Ruy Braga，University of Sao Paulo

Dilma Rousseff (劳工党，Workers' Party)在10月31日的巴西总统大选中，以1200万票的差距击败了Jose Serra (巴西社会民主党，Brazilian Social Democracy Party)而胜选。尽管在最后一轮投票中出现了意外激烈的竞争，但是这样的结果反映出了现今领导阶层的政治霸权。

Dilma Rousseff获得了多数东北部选民(67%)的支持。东北部是巴西最穷的地区之一，而这里的居民也是因所得转移计画(Bolsa família)而受惠良多的一群。事实上，Dilma Rousseff的胜选代表了巴西历史上一个新的政治与社会现象的巩固：「Lulismo」。

政治学家Andre Singer为了理解这个新兴的政治社会现象，比较了2002年与2006年的大选结果，发现所谓「Lulismo」现象的浮现是由于低收入选民(在总统Lula的计画下他们可以获得一或两份最低工资的人)的支持所导致。同时，特别是在mensalão丑闻(违法支付国会议员每月零用金以交换其支持)爆发之后，巴西总统也流失了都市中产阶级—那些曾经在2002年支持过他的人—的选票。

到底何谓Lulismo？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90年代的巴西是正值企业生产的重建、私有化、战斗性工会面临危机的时期，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私有化导致了失业率的增加，也削弱了劳工组织的基础。传统福特主义的团结连带感被不定期的就业模式所取代，所以战斗性工会团结连带感就面临了危机，并且使得工会变得更加官僚。

在Lula执政之后，工会的官僚主义更加明显；但是，他们也保留了Cardoso经济政策的本质。此外，Lula透过延揽工会干部入阁而减少了社会运动的出现。靠着收编反对势力和安抚被支配接级两大策略，Lulismo让1970与1980兴起的社运消失了。之前不曾参与过选举的Dilma Rousseff正是体现这个官僚霸权的例子。

现在我们可以定义何谓Lulismo了：一种选举式(co-optative)革命，或称为消极革命(passive revolution)所产生的霸权，通常在资本主义半边陲国家中发生。这些国家表面上宣称会实践社运的历史诉求，然后实际上却吸收社运干部到国家机器中，企图去反过头来去削弱社运的反对力量。最后的结果就是社运也开始积极地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剥削背书了。

Lulismo的传承

巴西的底层阶级也同意这样的观点(虽然较为被动了点)。他们完全陷入了对政府政策的的依赖网络之中(例如Bolsa Familia这项政策)、公立大学之族群平等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扩大、推动减少劳动市场上临时就业现象

（文接第12頁）

全球迁徙：来自峇里岛(Bali)的观点

Yoshimichi Sato，**Tohoku University**，執行委員

10月29日，我在峇里岛参加名为「Today's Trends of Global Migration in Japan and Indonesia」的国际会议。这是由我主持的社会阶层与不平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所主办的。演讲者包括2位日本人和2位印尼人。日本讲者谈论跨国迁徙—特别是迁徙到日本；而印尼讲者则讨论印尼到峇里岛的国内迁徙。虽然迁徙的动机不动，但是仍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全球化对迁徙的影响，以及迁徙对移民母国的影响。

很显然地，全球化对让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迁徙更加容易。但是，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国内的政策(像是移民审查)如何对影响了整个迁徙的图像。例如，1990年起日本政府开放了巴西的日本裔的移民是为了要补充国内半技术和无技术工人的劳动力短缺。而多年后曾经是体力劳动者巴西移民成为了中产阶级，例如自营业者，便利用他们的族群资源或是中阶管理的身份，作为巴西劳工和和高层的日本管理阶层的沟通桥梁。这样的现象是出乎日本政府意料的，而且是一个全球化、迁徙、在地制度(或政策)之间如何互动的有趣议题。

会议中另一个有趣的议题是职业声望。一位印尼讲者提到峇里岛的农夫雇用来自爪哇(Java)的移民而不雇用童工，因为尽管作农的收入较高，但是雇主想让他们的小孩上大学。讲者认为这是农夫职业的低声望导致，这也是决定迁徙的因素之一。

最后，这次会议非常成功地彼此分享了日本和印尼的移民经验，也让我们对于全球化下的迁徙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纪念Mattei Dogan (1920-2010)

Arnaud Sales，**Université de Montréal**，前研究副会长

Mattei Dogan

Mattei Dogan于2010年10月10日于巴黎过世。他是「Environment and Society」(1971-1986)，以及「Comparative Sociology」(1986-2006)之研究委员会的创始者兼会长。做为他同事与朋友的我们将会永远怀念这位拥有坚强性格和宽大胸怀的学者。他在罗马尼亚出生，大学就读于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接着在Sorbonne拿到History and Philosophy的硕士和博士(Doctorat d'État è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1953年他加入了位于巴黎的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而且CNRS后来也颁给他荣誉研究员的头衔。从1973到1991他也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教授；同时也在Tokyo、Yale、 Firenze等大学客座。Mattei Dogan把实践的热情转换为对于社会学或政治学之学术生涯的一部份，除了组织过许多会议和当过超过10种期刊的主编，他也在ISA或是ISPA创立且带领了研究委员会。

Mattei Dogan同时也发表了200篇以上的著作，议题涵盖了经验性、理论性、方法论、认识论等等的面向。大部分作都是关于政治与领导的菁英的研究，包括了：Mandarins of Western Europe (1975)、Pathways to Power (1988)、Elites, Crises and the Origins of Regimes (1998) 、Elite Configurations at the Apex of Power (2003)。在政治行为与选举研究的领域中，他也相当有名，特别是女性投票的模式和研究价值观（民族主义、宗教、正当性）的社会学的意涵。他也不只有在巴黎从事研究，早年也在德国、义大利、英国、美国研究过。How to Compare Nations (1990) 这本书中发展出了一套政治社会学的比较方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也分析学科分野、科际整合、社会科学中不同学门领域的混合等议题。请参考：Creative Marginality: Innovation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Social Sciences (1990) (with R. Pahre)。

2000年的时候Mattei Dogan成立了一个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基金会。这也促成了后来ISA得以成立Fondation Mattei Dogan ISA Prize颁发奖项给杰出的社会学家。只可惜这个基金会被上一届的执行委员会于2010年7月时给结束掉了。总之，这个基金会颁发了21个杰出奖项给社会学家，以及资助3个海外发行的论文集。

ISA非常感念Mattei Dogan曾担任过「Environment and Society」之RC20和「Comparative Sociology」之RC24的领导工作，以及任何对于社会科学发展有益的成就。愿他永远安息。 ■

注意：威权政府正在威胁着社会学!

Elena Zdravomyslova，European University, St. Petersburg，執行委員

Andrei Vardomatsky

科学史家指出社会学的发展和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威权政体会限制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并且使得社会学—若这学科还存在的话—变成压迫统治的传送带。如此一来，谁也不可能从事独立的社会学研究，并且政府还会干预社会学家的立场，甚至威胁社会学家的生命！

以上所述的情境就是Andrei Vardomatsky的遭遇。他是「Novak」研究室的负责人。他过去十几年来Novak每个月都对白俄罗斯的公民进行民意调查，而且也是「Tell the truth!」这个公民组织的专家学者之一。这个组织的倡议目标是告诉大家白俄罗斯正面临着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车诺堡事件对大众健康的危害等等。此外，他们甚至推荐其他的总统候选人。

2010年5月18日，Vardomatsky博士的研究室被政府无预警搜索；接着在月1日，这位社会学家在从立陶宛返回明斯克(Minsk，白俄罗斯首都)的途中在边境莫名其妙地遭到政府扣留。

依照许多评论者和Vardomatsky自己所言，这些举动是威权政府对其专业研究和独立媒体的警告，而且正好选战正在进行中。总统大选将在12月举行，现任的总统Alexander Lukashenko正准备操作让自己连任3次—从1994年开始。而且依据宪法，他可以毫无限制地连任下去。所以政府正在对由公民组织、社会科学家、独立媒体所组成的反对阵营进行政治干预。而且从2001年和2004年选举时就发生过的例子来看，这已经是常态了。

白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广泛地报导法律的强制搜索行动，但是公立的媒体却噤若寒蝉。政府向来对专业的民意调查非常提防，选举的时候特别如此。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大选期间政府会威胁这些社会学家和公民组织的原因。

国际的社会学社群对于Vardomatsky被政府侵扰的事件表达了高度的关切，并且声明要捍卫社会学与学者的专业权利。政府对独立运作的社会科学进行压迫的举动正彰显了威权政府的脆弱与不堪。当社会学正在朝向无边界的理想迈进时，研究资料的收集也将不受国家疆界的限制。白俄罗斯若没有独立的社会学，并且继续保有苏联式对待专业学科的态度，其社会将永远被宰制。被驯化的社会学毫无价值可言，而且也代表了这个社会也彻底被驯化了。这样的社会，没有言论自由，多元文化也不曾存在。■

（文接富士康——全球的掠夺者）

帮忙他们生产商品的人漠不关心。据估计，Apple的I-Phone四代机的毛利率为50%，相较之下，其他的竞争者则是20%-40%。Apple自己享有了空前的利多，却还是极尽所能压低供应商的利润。印度、越南、柬普寨、孟加拉的制造商就相当不满中国使得他们成为间接供应商、甚至被踢出供给炼。但是，在承受来自压低成本最严酷冲击的人，始终还是那些在供给炼最底端辛苦工作的劳工。

因为来自于Apple和其他品牌厂的压力，以2010年5月—当时发生了连续13起跳楼自杀事件(被中国媒体称为「自杀潮」)—的时候为例，富士康深圳厂(员工数约50万)的生产线工人的月薪只有900人民币(132美元)。这样仅能糊口的工资不但根本无法满足劳工的需要，还要强迫他们每个月加班超过100个小时。这个数字是中国劳动法所规定之上限36小时的3倍。

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公开声明表示连环自杀事件与其公司内部的管理、工资、工作或宿舍环境毫无关连，而是工人的个人问题所导致。近来媒体报导富士康在中国各地迅速扩厂，目标是在2011建立一个至少130万的「制造帝国」。当这两项因素结合在一起，不免令人担心富士康将无法在员工自杀悲剧这件事情上有任何反省。在这段高度扩张的期间，富士康除了考虑如何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和股票价值之外，还会为他们的年轻员工做些什么？

从今年五月到九月，「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组织」(SACOM)和由来自台湾、中国、香港超过60位教授与学生组成的「富士康调查小组」，在位于深圳、南京、昆明、杭州、天津、廊坊、太原、上海、乌海的12处富士康厂区进行研究，包括了1736份的问卷、300人的访谈。此外，还有14名研究员乔装为工人进入工厂进行秘密调查。透过这项独立调查，我们要求富士康面对并解决他们的劳动问题，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以他人的性命为手段去追求经济成长或累积财富。

（文接第9頁）

全球化与突厥世界

Tina Uys，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South Africa，
國家學會副會長

有件令人非常令人兴奋地(也有些不安)的事：我踏上了一趟29小时、从南非到吉尔吉斯(Kyrgyzstan)的Bishkek的旅程：参加突厥社会学大会(9月21-24日)。因为我看到报导上说在吉尔吉斯南部有乌兹别克族(Uzbek)和柯尔克孜族(Kyrgyz)的族群暴力冲突，而且我还没有拿到签证—只有一封来自大会的信，告诉我签证正在玛纳斯(Manas)国际机场等着我。不过，当我抵达机场的那一刻，一切的不安就烟消云散了。大会非常尽力地确保每一位参与代表能顺利参与会议，我感到相当安全，并且尽情享受在那里参加会议的每一刻。

在吉尔吉斯的山上踏青的社会学家

大会由在Kyrgyz-Turkish Manas University的突厥文明研究中心(Center for Turkic Civilization Studies)所举办。大会委员会的秘书长是来自该校社会系系主任的Ilhan Sahin和吉尔吉斯社会学会(Kyrgyz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KSA)的会长Kusein Isaev。KSA是ISA最年轻的国家会员，也是仅仅4个来自突厥地区的国家会员之一。另外3个分别是亚塞拜然(Azerbaij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哈萨克(Kazakhst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土耳其(Turkish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以下的国家分别代表参与出席这次大会：吉尔吉斯(Kyrgyzstan)，哈萨克(Kazakhstan)，土耳其(Turkey)，俄罗斯(Russia)，亚塞拜然(Azerbaijan)，库德斯坦(Kurdistan)，塔吉克(Tajikistan)，鞑靼斯(Tatarstan)，乌克兰(Ukraine)，乌兹别克(Uzbekistan)。

大会以非常优美的音乐、与传统舞蹈、Manas英雄史诗的表演来开幕。后者包括了以Manas为主之神话故事的总和。在开幕场次，我非常幸运地的有机会鼓励在场的200多位参与者能够参加ISA。而且我也在注册桌上放置了介绍ISA的小册子。

大会主题是「全球化与突厥世界」。有200篇论文3天内分别在40个不同的场次发表。讨论相当生动，也显示出这个地区的社会学非常强韧有生命力。我也很欣慰地看到许多年轻社会学者将这个学科当作他们未来的志业。

我想，阻碍像我这样来自ISA的参与者尽情投入这个大会的，无非就是语言问题。这次会议的主要语言是土耳其语(Turkish)和俄罗斯语(Russian)，另外加上柯尔克孜语(Kyrgyz)和哈萨克语(Russian)。吉尔吉斯的官方语言是柯尔克孜语(最近才被列为官方语言)和俄罗斯语(除了边境少数人之外几乎所有人都了解)。可惜的是，上述的4种语言，我完全不懂，而我必须藉助一位非常杰出的翻译：Meerim Kinalieva才可以和其他人沟通。她的帮助真是难以形容的珍贵。

来自American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http://www.auca.kg/)的Galina Gorborukova邀请我和Nikita Pokrovsky (ISA执行委员)去对该校的社会系毕业生的研究计画进行讨论。他们的热情和对英文的掌握度让我印象深刻。我想这可以看出吉尔吉斯社会学的未来将无可限量。

另外也值得一提的是，Kusein Isaev教授邀请Nikita和我到一位会员的家中作客。这让我不但见识到了吉尔吉斯人的好客，也了解了一部份他们的家庭生活。我非常荣幸可以与他们分享家庭聚会的喜悦，而且发现他们家庭成员是如此紧密的彼此联系着。

最后，我要谢谢Kyrgyz-Turkish Manas University的突厥文明研究中心邀请我参与此次大会，特别是招待我的Isaev教授和Sahin教授，以及Meerim Kinalieva的翻译，他们让我感到宾至如归。我期待ISA和突厥社会学家们可以有更紧密的互动。Kyrgyz-Turkish Manas University的管理阶层和其他国家代表的接触，也让我们发现他们非常有意愿展开任何形式的合作。■

社会怎么了？—来自波兰的历史观点

Grażyna Skąpska，Jagiellonian University，Kraków

2010年9月，波兰社会学会(Polskie Towarzystwo Socjologiczne，PTS)和Jagiellonian大学共同举办了第14届全国大会。来自世界各地和波兰国内共计1200多名的学者前来共襄盛举，相当成功。更重要的是，有3分之1的与会者是学生。这次大会包括了3个全体会员会议、4个座谈会、85个一般场次、以及数个特别场次和看板论文。开幕演讲者是Claus Offe，闭幕演讲者则是Michael Burawoy。Burawoy更和年轻的社会学家讨论社会学及社会学家在当代与ISA中所扮演的角色。

PTS大会开幕演讲，Kraków

这次大会主题代表了波兰社会学的传统—特别是专业社群的传统，展现了学者积极参与批判性的社会议题辩论，同时也表现出了他们对理论的高度兴趣。PTS是波兰最主要的学会，它的历史从1956年开始，但最早可追溯回1927年时Florian Znaniecki所创立的Polish Sociological Institute。1931年在Poznań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大会，同时也依照Znaniecki的提议正式改名成为波兰社会学会。这种形式的组织在欧洲是首例。

不幸地在战后史达林(Stalin)统治期间，社会学在1951年之后开始被贴上资产阶级(bourgeois)的标签，所有社会学系所和机构被迫关闭。直到1956年，社会学才重回学界，原因是Universities of Warsaw和Universities of Łódź以Stanisław Ossowski为主的社会学家在波兰哲学会(Polish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下设立了社会学小组，而波兰哲学会是世界社会学会的会员，同时Ossowski教授是ISA的创始者之一。隔年，这个小组「自动转型」成为波兰社会学会，Ossowski被推举为会长。在共产统治期间，虽然学术界仍受政府的意识型态控制与把持，但是社会学保有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性，提供了批判性的和自由言论的空间。

过去的会长包括了上述提及的Stanisław Ossowski之外，还有Nina Assodobraj (1964-1968)，Władysław Markiewicz (1968-1972)，Jerzy Szacki (1972-1976)，Stefan Nowak (1976-1983)，Janusz Ziółkowski (1983-1989)，Antonina Kłoskowska (1989-1994)，Antoni Sułek (1994-1998)，Andrzej Kojder (1998-2002)，Włodzimierz Wesołowski (2002-2005)，Piotr Gliński (2005-present)。现在的会员将近有1200人，荣誉会员包括了James S. Coleman，不久前才刚刚过世的Shmuel Eisenstadt, Theodore Abel，Stanisław Andreski，Zbigniew Pełczyński，Jerzy Zubrzycki，Melvin Kohn，Jiri Musil，Richard Grathoff，Jan Sedlacek，Feliks Gross，Vladimir Yadov。PTS也定期出版英语期刊：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文接第13頁）

（文接富士康——全球的掠夺者）

今年中秋节，我们拜访了17岁的田玉—一位自杀的生还者。3月17日，这位无忧无虑、长展笑颜的女孩从深圳龙华厂的员工宿舍4楼一跃而下。和其他自杀者比起来，她或许幸运许多，因为她还活着；然而，她也是不幸的，因为在经过多次的手术治疗之后，她仍然半身瘫痪，必须坐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了。为了保护自杀工人免于遭受到不公的对待，我们极力要求富士康及其顾客改善劳动条件。我们同时也鼓励可信赖的NGO或学者在工作环境提供劳工权利的参与训练。工人应该透过民主组织或集体议价的方式去行使其权利。在写作期间，富士康压制了位于印度Tamil Nadu厂由7800位工人发起的和平静坐罢工。富士康在印度的管理阶层拒绝和工会代表协商调涨工资。现在一位4年年资的工人每月只有4800卢比(106美元)。10月9日，印度警方逮捕了上百名静坐罢工者，并将他们关进了Vellore Central监狱。

立即行动！(1)请支持名为「India: Over 500 Workers Jailed in Dispute with Foxconn」的LabourStart运动(http://www.labourstart.org/cgi-bin/solidarityforever/show_campaign.cgi?c=790)；(2)参与「Create Humane Labor Standards at Foxconn and End 'Stealth Manufacturing'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学生与学者连署(http://sacom.hk/archives/649)。请跟SACOM 的Debby Chan (debby@sacom.hk)或是Jenny Chan (wlchan@sacom.hk)联络。谢谢！ ■

质问跨国主义：德国社会学会成立100周年

Petra Rostock，Linda Supik，Goethe University，Frankfurt/Main

德国社会学会(DGS)于10/11-10/15日在法兰克福(Frankfurt/Main)举行了百年庆祝大会(Centennial Jubilee Congress)，主题是「Transnational Makings of Societies」。(http//dgs2010.de/English)

百年之前，民族国家是新的行动者，而且，「以民族国家为疆界的社会」(national society)是当时仍在形成中的新学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现在的任务则是提出社会(the social)的新视野：跨国社会(the transnational space)。「它是个适切的概念吗？」「如何概念化？」「如何测量及研究？」以及众多与会者都问的问题：「它会取代民族国家而成为新的研究焦点吗？」当一个国家的(national)社会学组织一直被质疑其研究对象和领域而倍感威胁，或许是件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吧。

跨国主义这个概念在法兰克福就像是行话一般。虽然它早就轻易的就被整合进其他的场次的讨论之中，但是却从来没有成为主题。有时，「跨国的」这个概念以广义的姿态被呈现，不具特殊性，也因此常与「国际的」(international)混淆。

过去一百年来德国的社会学是如何变迁的呢？当然，男性中心的偏见仍显而易见。一百年来，德国社会学会只有一位女性会长。不过，学术社群中的性别比例近年来有比较平衡一些。至于「跨国性」(transnationality)呢？发表人名单中有呈现出来吗？邀请「来宾国家」与会向来是大会传统，而且皆是邀请法国与美国—另外两个大社会—的知名学者。

在文化相当多元的法兰克福，因为当地有相当多的学生参与大会，因此参与者的脸孔皆非常的「白」。白人优势仍然很普遍，即使是在最进步、最受欢迎的场次：「以后殖民女性主义观点论跨国主义」里也一样随处可见。虽说是最进步的，但是，这些人所使用的概念仍然相当表面，而且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基本规范预设有所抵触。我所谓的基本规范，指的是去将社会批判与知识论结合起来去挑战真理霸权，并去强调既有的霸权是如何地奠基在排除、同质化、他者性(alterity)之上的。

面对德国持续在辩论族群整合、伊斯兰，以及被污名化的那些移工、因为文化差异而被归类为天生的劣等族群，我们对于最后这场名为「文化全球化：跨国宗教社会的新型态」

Hansfried Kellner，Thomas Luckmann， Peter Berger (David Schommer攝)

的讨论相当失望。这个场次分别代表了三位知名的学者(Peter L. Berger、Hansfried Kellner、Thomas Luckmann)，不过对于现状的分析以及对于国家社会未来的观点则是付诸阙如。

相对的，大会团队将当代社会问题与剧院和音乐的发展做了非常好的连结。不过议程安排对于与会者来说太过于不近人情。没有任何的休息时间。主办者似乎认为与会的学者从来就只有和知识、空气为伍。

我们都能理解对于过去反思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这个百年庆祝大会上，我们更希望旧的和新的概念在未来会持续被挑战，特别是「national」这个概念。此次大会清楚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关于「national」是否适合成为社会学的分析单位的讨论，仍然缺席。■

（文接亲吻青蛙：社会学的世界主义转向）

第三阶段揭开了这全球相互连结性最核心、最隐微、最不必要的结果：实际存在的世界化—全球他者(global other)的结束。这正是重点：去区辨哲学上的世界主义和社会科学的世界化。

从康德哲学的角度而言，世界主义意味着某种主动的事物，既是一种是任务，也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更是一种自愿的选择；很显然地这是菁英的工作，也是一种由上而下的观点。但是，今日所谓的世界主义，是一种平庸、强制、混杂的世界化，它则揭露了隐微且让人不安的一件事实：它在民族国家、法律、商标的表面下相当有力，而且敌对性很强；它正如同持续挥舞民族主义旗帜，以及民族认同持续地被强调一样，从社会由上而下地延伸到家庭、工作场所、个人等的日常生活面向。平庸的世界化为何？举例而言，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获得大量的食物，而且我们可能都拥有足够的金钱去品尝各地美食。有些人认为这是后现代折衷主义，在我看来这不是反对现代性，而是一种对何谓现代性进行反身性思考的新尝试。所以，烹调、全球性的风险、艺术、全球文化冲突(例如丹麦的穆罕默德卡通事件)已经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多元性中被重新组合、比较、与并列。

(文接第11頁)

（文接亲吻青蛙：社会学的世界主义转向）

火山爆发型的社会地景、激化的社会不平等必须重新被对应到巨观和微观的层次上，以及透过沟通、互动、工作、经济、以及各种社会与政治的实作，水平地投射出去。

Chang Kyung-Sup曾经说过：就像气候变迁一样，主流的社会经济转型模式并不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国家。试想：全球自由贸易与金融、超越国家疆界的企业组织和跨国的生产制造、全球化的劳动、全球化的竞争与阶级冲突、全球化的政策与管制(强势的IMF等)、网路沟通和网际空间、生命形式透过生物科技被巧妙的操作与安排、各种形式的风险(恐怖主义、金融危机、AIDS、SARS、新流感等)、跨国人口的重新组成(移工、配偶或小孩的迁徙)、全球性的艺术与娱乐，以及全球性资助和控制的区域战争。没有一个永久的系统阶层、序列或选择性——不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是在不同的族群、宗教、区域里面，可以免于面对上述这些新的文明化力量。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些都是每一个国家及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与新的文明化过程结构性的交织在一起。我称此一文明化过程为「反身的世界化」(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而这个全球性文明化的情境，是一种反身现代性，或是第二现代性。

> “……今日所谓的世界主义，是一种平庸、强制、混杂的世界化，……”

近期的世界史似乎正在要求着大家：若要在这个新文明化的潮流下生存——遑论想要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就需要每个国家主动积极地去内化这个过程。这里，社会学的意涵是相当清楚的：全球的他者就在我们之中！孤立式的努力—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宗教基本教义派、民族基本教义派、媒体或网路控管—都会遭受到国际的道德谴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效的)。事实上，接受或拒绝这股力量仍然超乎任何有意图之社会或政治的选择之外，因为，这股力量具有全球反身性—意即，这是一种强迫，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命令：合作，否则等着失败！

3. 世界主义观点的社会学

在争论世界主义和世界化的人都是欧美学者，这是相当矛盾的一件事。这两个概念主要在处理我们身处的这个相互连结的世界，以及其中的全球化、风险、权利、责任等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也反映出了现代世界系统中古老的核心观点，也是以下四项偏见的源头。

第一，虽然努力把贫穷、发展或是新兴经济型态纳入考虑，但是它是一种富人的观点。第二，即使世界主义理论想要变得更多元化，可是它却根植于西方。第三，世界主义理论为了避免文化偏见，所以自己用想象的从文化差异进入到普同世界(旅行到异文化之地而仿佛自己身上完全不具有之前的文化，提供新的全球化路线的同时却仿佛没有改变任何既有的文化脉络)。第四，如同Craig Calhoun曾经指出的，尽管世界主义关心社会问题，但是由于它就处于世界体系的核心位置，所以想象出了一个比真实世界更系统化、更整齐地被连结的世界。以上这些是世界主义社会学必须克服的问题。

让我用以下七个论点来总结何谓社会学的世界主义转向：

1.早期的现代性阶段是被民族国家所形塑的。虽然市场或其他领域越过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但它会去管理人们要面对的风险。

2.现代社会与政治理论从民族国家的支配环境中发展而来，并将民族国家内化为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这个社会被民族国家的真实权力和普遍的期待(期待民族国家来组织这个世界)所影响。

3.早期的哲学世界主义从以下的脉络发展而来：要求各个族群的人们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仿佛这些人所处的社会情境从来不存在。

4.要去正视全球自由贸易与金融、超越国家疆界的企业组织和跨国的生产制造、全球化的劳动、全球化的竞争与阶级冲突、全球化的政策与管制(强势的IMF等)、网路沟通和网际空间、生命形式透过生物科技被巧妙的操作与安排、以及全球性资助和控制的区域战争。

（文接第13頁）

（文接我们要如何编织世界社会学？）

Beck的世界主义模型从全球化理论发展而来，参照的都是欧美学者的研究，然后投影放大到整个世界。这个观念源自于北方的知识份子，用北方的经验，也来自于北方特权阶级的经验。民族国家的消逝，反身性，多元性、相互连结性、全球恐怖主义、全球化他者—我们可以不要再听到这些北方的论述了吗？

图片说明：ISA的副会长正在ooVoo上编织全球社会学：最新一次的视讯会议

我在澳洲写下了这篇文章，而且，我是一个英国殖民者的曾孙女。从原住民的观点来看，全球化他者一直在我们之中，已经200年了。英国1788年开始占领他们口中的澳洲，同时，在Königsberg的康德正在梦想一个和平的世界主义法则。约200年前，这个全球他者将战火与武器带到了拉丁美洲，100年后又征服了非洲，而且以极端暴力的方式对待这个地方(例如刚果)。

然而，在Beck的分析中，世界的历史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第二现代性中没有永久的系统化阶层，每个人都是被反身性世界化所结构。很明显的，意思就是所有事物都环绕着世界而运转。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想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方法就是去研究其他非欧洲的思想。而这正是当代社会思想的问题：那些有头有脸的社会学家从不研究世界上其他多数人的思想。

在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中，Beck和Grant列出了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Bourdieu、Coleman、Foucault、Giddens、Goffman、Habermas、Luhmann、Meyer、Parsons，甚至Beck本人，然后还注明说从一个特定社会中得到的观念被悄悄地转变为普世的。没错！但是他们没有说的是：例如Bourdieu和Coleman等人就是因为来自于世界级的大都会，所以才那么具有影响力。一个全球的阶序始终存在着，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在Beck的名单中，我们找不到Nandy、Hountondji、García Canclini、dos Santos、Quijano、Das、el Sadaawi、Montecino、Shariati、甚至是Spivak。她/他们是全球前10大的思想家，只是不住在欧美，以及总是写边缘的议题。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全球的知识社会学。这个领域最好的代表是Benin的哲学家Paulin Hountondji和他的同事。殖民主义建立了一套科学分工的体制，到后殖民时代仍是如此。边缘的国家当作是资料的采矿场，而大都会地区是理论的生产中心。在理论被生产之后，又再度输出到边缘国家当作是应用科学，也被当作是学生的学习包裹。Hountondji将这样的边缘国家知识分子姿态描述为向外的—被导向外在的权威来源。每个人从大都会学习到理论、方法，然后到大都会深造，发表大都会的期刊论文，然后加入大都会的隐形学院。各位读者，你们在这有发现了什么和社会学的相似之处了吗？

对社会科学来说，对于大都会思想最有力的替代选项不是在殖民主义之前，而是在对抗殖民主义时产生的。这包括了Jamal ud-Din al-Afghani、孙逸仙、Sol Plaaje，以及后来的Frantz Fanon和Ali Shariati。这些人是政治史上的熟悉人物，但从来不出现古典理论家的名单里面—在他们开始批判地分析社会转型时，或许我们就应该把他们加入到名单里面。

在社会学之中，更新阅读名单的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去复原、正视、连结从殖民地和后殖民发展出来的社会思想。2010年的三本书标志了这个时机：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The ISA Handbook of Divers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Decolonizing European Sociology。这些著作以及其他的文章将提供我们丰富的思想泉源和素材，去编织一个真正的「世界社会学」(World Sociology)。■

（文接论「LULISMO」）

、在通膨之外提高最低工资、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复苏、或是最近在提倡的透过借贷增加消费。他们正在「被动地同意」这些政策。

巴西的被支配阶级已经疲于政治创新和在经济上捍卫自身了。现在他们依赖着经济成长所伴随来的所得重分配，并且一直支持着Lulismo以及他们的新代言人：Dilma Rousseff。

但是，别忘了这次大选中有1000万人投下废票，另外还有2000万人在第一轮投给了Marina Silva (绿党)，以及数百万人投给了极左派政党。这些不同的声音代表了对于巴西两党政治的不满，甚至使得Dilma Rousseff胜选庆祝大会上显得冷清且官僚。接下来就要看Lulismo在没有Lula的年代里会怎么去回应这些异议了。■

（文接社会怎么了？—来自波兰的历史观点）

在ISA和PTS之前始终存在着人际与知识的连结。PTS的几位会员先后都担任ISA的职务，例如Jan Szczepański和Piotr Sztompka先后担任过1970-1974年和2006-2010年的会长，Magdalena Sokołowska 则是1990-1994的副会长。

在2010年之前PTS共举办过13次大会，主题和议题显示出了波兰社会(至少从1945年开始就臣服于「自然的」实验)的变迁和公共关怀主题的变化；无论如何，对社会学家来说，在波兰的生活是一个实存的「实验室」(在国内外都是如此)。在这里可以研究20和21世纪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过程；定期举办的大会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公共辩论的空间而言，在发展上具有很大的助益。1970年代末，当公共辩论历经了最批判性的一次转向，「口述社会学」(oral sociology)这个名词出现了，因为最重要的社会学见解只可以被讨论、但是却不能发表。

1956年之后政治解冻的头几年，PTS的大会反映出了波兰社会学家的视野和胸襟：Changes in Polish Socie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New System (1965)，Sociological Theory and Research vis-à-vis Societal Practice (1969)，The Development of Polish Society and Sociology (1977)，Polish Sociology Facing the Country’s Problems (1981)。

在1989年之后，大家都理所当然地打目光投注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型上，包括理论与经验的各种议题。包括像是Fundamental Change and Its Challenges: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Present (1990)，或是People and Institu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der (1994)。最近几次的大会，包括今年这次的主题则聚焦在差别化过程以及社会与社会学本身的面临的焦虑与不确定性。例如：What Associates Us，What Differentiates Us，What’s Happening to Society (社会怎么了)?

在今年第14届的大会中，Claus Offe以「现今所谓的政治与社会的进步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为题的演讲上，更是充满了上述的不确定与焦虑感。各个场次的发表、座谈、特别场次等也都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会员大会和座谈则是面向未来的。的确，许多的重要场次都着重在以对当代现象分析为基础之上然后去「阅读未来」(reading the future)。

本届大会以Piotr Sztompka所带领的其中一个场次讨论了「全球化下的社会与社会学」以及Michael Burawoy讨论的「公共社会学」作为会议的结论。这样闭幕的讨论让我们不但了解、还更加积极地将社会学阐述为是一种未来导向而且是投身公共领域的一门学问。■

（文接亲吻青蛙：社会学的世界主义转向）

近期的世界史似乎正要求着大家：若要在这个新文明化的潮流下生存—遑论想要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就需要每个国家主动积极地去内化这个过程。这是为什么我称此一文明化过程为「反身世界化」(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而这个全球性文明化的情境，是一种反身现代性，或是第二现代性。

5.我不认为民族国家正在消失中。我认为，民族国家只是全球权力游戏中的一个行动者。重点是那个权力游戏，而不是民族国家。

6.这样的焦点转移需要社会科学的再结构化。这不只包括理论、概念、方法的面向，还要扩及每一个研究组织。每个批判的焦点必须放在世界上每一个新的不平等上。所有的基本概念—特别是民族国家—都要重新检讨。这些之中许多是「僵尸概念」(zombie concepts)，意即只出现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存在的概念。

7.世界主义社会学不仅仅包括社会科学根基的重组，还包括焦点的转移：从方法论国族主义到方法论的世界主义。这个转向要还要转向批判。而批判的焦点必须放在新兴的不平等上。以往具焦在民族国家，使得客观、价值中立(value-free)的社会学很可耻的臣服于民族国家的淫威之下，完全看不见世界上支配和不平等的根本转变。

这个社会学的世界主义转向，有风险，但也是个机会。所以，现在让我们亲吻青蛙，看看青蛙会不会变成王子—开始重新对应这个全球化时代之中新的风貌、潮流、冲突、行动、和制度。毕竟亲吻并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我说的没错吧？

关于世界主义社会学的争论，请见Ulrich Beck/Edgar Grande (eds): 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y: Extra European and European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3), 2010；以及Soziale Welt 61 (3/4), 2010。■

(文接达卡：绝望之城)

这个400年的老城，亲眼目睹了自身的兴起与衰退，也见证了富庶与贫穷。17世纪末，蒙兀儿帝国(Mongul)的统治使达卡成为一省的首都；在英国统治期间，达卡没落，加尔各达兴起；但在1971年又成为孟加拉首都，因此快速成长(虽然缺乏规划)。在有能力且民主的市政府之治理下，我们期待达卡将会恢复昔日的光辉，从一个绝望的城市转变成为一个繁荣的大都会。 ■